

方志文摘

· 第一辑 ·



洛阳市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

方志文摘

· 第一辑 ·

目

录

洛阳市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编

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	朱士嘉 (3)
修志刍议·····	刘永之 (20)
修志续议·····	刘永之 (36)
论历史地理学和方志学·····	史念海 (62)
整理旧方志与编纂新方志刍议·····	寒冰 (80)
关于编写人物志的几个问题·····	李 地 (88)
修志必须认真拟订篇目·····	李 辉 (101)
漫话方志·····	法舜 冷文 (111)
编写人物志的几点经验·····	山西省图书馆 (117)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123)
编者的话·····	(116)

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

· 朱士嘉 ·

地方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分门别类的综合记录，它既反映了各该行政单位的天文、气候、地形、自然资源、自然灾害以及动物、植物、水族的生长、迁移、灭绝的过程；又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地方志历史之悠久，地域之广阔，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不失为我国文化的特产。对于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以及科学技术发展史，地方志都是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

一、地方志的起源

地方志是在封建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据古书记载，周代已有负责掌“邦国之志”的“小史”，又有负责掌握“四方之志”的“外史”。所谓“四方之志”就是当时诸侯各国的历史，比如：《郑志》是郑国的历史，《楚梼杌》是楚国的历史，《齐乘》是齐国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有人编写《禹贡》，扼要地记述了全国的疆域、土壤、物产、赋税和风俗等等。这部书的出现，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渴望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统一的要求。汉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杰出的通史，文字尔雅、体例优异、内容丰富。两千年以来，陆续编写的史书，特别是官方

主编的断代史，无不以《史记》为圭臬。它象《禹贡》一样，给方志的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班固的《汉书》为地理志开创了完善的体例。在这个基础上，随着社会经济逐步发展，出现了全国性区域志。例如，晋挚虞的《畿服经》，170卷；隋代的《隋区域图志》，129卷；唐代的《元和都县图志》，40卷；宋代的《太平寰宇记》，200卷，直到元明清三代编的《一统志》，必须指出，东汉以来，各种区域性专著，如山志、水志、人物志、风俗志、图志、物产志、寺观志、金石志、艺文志，也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来了。沈莹之的《临海水土异物志》、酈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尤负盛名。上述著述在体例上内容上给地方志的编写以极大的影响。地方志反过来又促进了全国性区域志和区域性专著的编著。

东汉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袁康、吴平等编写了《越绝书》，反映了包括现在的浙江和江苏一部分地区的地理沿革、城市建设、生产情况和风俗习惯等等。这部书写得虽然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但已具有地方志的雏形。《浙江地方志考录》著录它不是没有根据的。《隋书经籍志》收录了三国吴顾启的《娄地记》等地方志共约三十多部，现在都已失传，幸经清代学者王谟、马国翰、陈运溶把它们一部份从唐宋类书所引者辑录出来，分别收入《汉唐地理书抄》、《玉函山房辑佚书》（附补编）和《麓山精舍丛书》。陈运溶的贡献最大，另有单刻本以孙治让所辑《永嘉郡记》，方法最周密、体例最完善。近五十年以来，赵万里辑录了《析津志》，张国淦辑录了《武昌记》等一百多种，张氏遗稿已转

让给上海图书馆。《中国古方志考》仅收录了他所辑录的一部分。

清代陈运溶辑录了南北朝湖广地区古方志四十多部。每部篇幅有限，少则几条，多则二、三十条，但还能反映各该地区的气候、地貌、土壤、水利、资源、土特产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发展概况；关于少数民族的活动，中草药的分布和猿人的生活也有所记载。陈运溶等人的辛勤劳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我们研究古方志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刚开始，地方志并不以“志”命名，而是称作“书”、“记”、“录”，也有叫做“传”的（例如《琼崖传》，大约专记海南岛之事）。“图经”这个名称，见于东汉，至南北朝已开始大量出现。所谓图经，是包括“图”和“经”两部分，“图”指的是关于一个行政单位的疆域图。后来充实内容包括沿革图、山川图、八景图、寺观图、关隘图、海防图等等。“经”是对“图”的文字说明，兼及境界、道里、户口、职官等情况。图经（最早的一种名叫《巴郡图经》，东汉但望撰。《华阳国志》引用此书。）的出现与军事学和绘图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汉高祖攻克秦都咸阳时，他的得力助手肖何发现宫中藏有不少地图，立刻把它收藏起来，如果里面没有军事地图是不会受到这么重视的。晋裴秀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定制图之体，有所谓“六法”者。后来江融作《九州设险图》，备载古今用兵成败之事。这些著作对于编绘方志地图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存最早的图经是《沙州图经》，修于唐开元年间（713—741），距今一千二百多年，可惜首尾残缺，图也不见了。

从今残存部分看，文字简洁、叙事明爽，对于沙州的天象、苦水、渠、泽、堰、堤、驿、县学、社稷坛、杂神、寺庙、冢、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记叙，其中十九个驿站是通新疆、印度和中亚西亚的必经之处，是中外交通的据点，地位很重要，但不见于其他载籍，可补新旧《唐书》的不足。另有《西州图经》，修于唐朝乾元年间（758—760），残缺更甚，仅存几十行。以上两部书原存甘肃敦煌石窟，二十世纪初期被法国伯希和劫走，幸经我国罗振玉整理，收入《鸣沙石室佚书》（影印本）和《敦煌石室遗书》（铅印本）。

《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虽所存无几，但其分门别类，有图有说，综合记录，这个体例已由宋代史学家继承下来了。这就说明地方志到了唐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形成比较完善的体例。这不但和绘图学的发展有联系，也是和史学、地理学的突飞猛进有联系。众所周知，《史通》的作者刘知几，《海内华夷图》的作者贾耽，都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地方志的编写不能不受他们的影响，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隋、唐以来，专记一地一事一物之书，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广阔的土地上蓬勃地涌现出来了。这些书在体例上方法上给地方志的编写以程度不同的影响。为充实地方志内容，提高地方志质量作出贡献。

随着宋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哲学、科学、史学、地理学、文学、考古学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方志编纂学也由渐进发展到新的阶段。宋以前的地方志不出地理书范畴。到了宋代始由“地理”扩充到人文、历史方面，人物志和艺文志在地方志中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在

体例方面，上承《史》、《汉》的余绪，下为方志编纂学打下良好的基础。宋代方志三十余部所以能流传至今并为人称誉，一方面因为它的质量较高，一方面因为印刷术广泛推行。宋代方志地图像其他篇目一样，所以能保存到现在，也是这个缘故。

二、地方志的特征

地方志有四个特征：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可靠性。

（一）区域性。地方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进行记录的。现存八千多部。省有通志，府有府志，厅有厅志，其他如州、县、关、卫、所、镇、屯等也各编有志书（至于地方志的支流，如山志、水志、湖志、堤志、塘志、园志、楼志、亭志、寺志、庙志、庵志、塔志、祠志、书院志等等，尚未包括在内）。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地方官聘请当地知名人士编修的。有时下级官员担任主编，少数由私人编撰。地方官每到一个行政单位，必先了解其境界、地形、土壤、人口、物产、风俗等等，而有关这些情况，经常可以从地方志中找到。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往往有编纂“正史”、一统志、会典、会要以及类书之举；在编纂过程中，征集各省府州县志书以为参考。有时要求地方官重修地方志，送请“学政”审核，选择，转交中央礼部或内阁。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有地方志一千多部，主要是编辑《四库全书》和《一统志》的时候，从各省各地征集得来的。地方志关于氏族、农谚、方言、园林、土特产、地方工艺等记载更具有鲜明的区域性。

(二) 连续性。地方志的第二个特征是连续性。往往有这种情况，某一种志书创修后，每隔多少年续修一次。过去封建王朝屡次发布修志命令。唐代规定全国各州各府每三年或五年给尚书省兵部职方造送图经一次。明代永乐以后发布修志命令较多，间附修志条例，要求地方官遵行。清代康熙要求各省、府、州、县勤修志书，省志则限令六十年编修一次。各省长官又命令府、厅、州、县官编修志书，供通志参考。现存清代常熟县志编修十三次之多，平均每隔二十年修志一次，在县志中是十分罕见的，人力财力不足之区，则修志次数减少，有的仅就旧志原版某一部分，例如职官、选举，修修补补，聊以塞责；个别县官甚至写序文夸夸其谈，妄称重修之本，瞒上欺下。总的来说，连续编修两次三次以上的县志，数量相当大，可能达到七千部，这就为我们提供以下四个有利条件：

1、便于了解阶级斗争主要是农民起义连续发生的情况和规律。

2、便于了解自然地理、自然灾害、气候、水文不断变化的情况和规律。

3、便于了解各该地区人口的增减、物产的丰歉，动植物和水族生长、迁移、灭绝的情况和规律。

4、便于了解各该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逐渐演变的情况和规律。

以上四种情况和规律，彼此之间又存在着内在联系，如果对它进行马列主义的分析研究，就能利用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三) 广泛性。地方志涉及范围很广，大致包括以下四

部分资料：

1、阶级斗争资料。包括农民起义、工人运动、明代倭寇侵华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苛捐杂税、兵制、边防、海防……。

2、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资料。包括农业资料以及其他方面资料，如自然资源、医药、水利、自然灾害、园艺、蔬果、林业、畜牧业、蚕业、丝织、渔业、茶业、盐政、工场、作坊、工厂、矿冶、手工业、建筑、造船、航海、印刷、贸易、交通、货币、度量衡、动植物、水族……

3、宗教资料。

4、其他资料。包括科举制度、风俗、方言、农谚、历史文物、美术、音乐、武术、中外关系、名胜古迹等等。名胜古迹需要进行整理，把它系统化、科学化，为发展旅游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吸引更多的国际朋友来我国游览。

地方志具有广泛性这个特征表现在门类的庞杂，内容的丰富以及引用材料的极其详备，可以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单从天文这一项目来看，古代统治者设置钦天监这个天文官负责观测和记录日食、月食、彗星、流星、极光、陨石的变化情况，各县又有所谓“阴阳生”者，负责观测和记录以上各种天象变化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就等于有上万个天文工作者在千百个观象台上共同观测记录同一种天象的变化情况，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壮举。他们夜以继日地辛勤劳动，给我们留下的天象记录是多么可贵啊！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正在组织人力编写《中国天象记录总表》，出版以后，将是天文学界一部重要的著作。另外，各地修志局聘请采访员。每处平均以十人计算，则八千

个修志局编修八千部方志，需要八万个采访员。一千多年以来，他们前赴后继，翻山越岭，采访资料，足迹所至，遍及全国，穷乡僻壤也不例外，其采访时间如此之长，范围如此之广，资料如此之多，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四）可靠性。

所有县志主要是本县人记述本县周围百余里上下近百年关于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的情况，它所依据的资料有档案、史书、家谱、诗文集、笔记、地方文献、古器物、碑记以及测绘和采访材料等等。其中档案原存县署六科（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内中一部分可靠程度较高。测绘和采访材料也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因为许多情况，特别是关于工农业生产和自然灾害的情况都是劳动人民首先提供的。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和创造发明如此伟大，地主资产阶级妄想把它掩盖也掩盖不了的。

张恕同治《鄞县志序》也说：“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

一般说来，通志（省志）的可靠程度不如府志，府志的可靠程度不如县志，县志的可靠程度不如镇志。行政单位愈小，其所修志书的可靠程度愈高，这是一般的规律。基层单位范围小，人口少，采访易，记述有所出入也容易发现，容易纠正。另外，他们受到的上级政治压力较小，控制差，执笔者在写作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如民国《法华乡志》记载徐光启的事迹比《上海县志》详细，民国《张堰志》记载顾观光的事迹比《金山县志》详细。浙江《双林镇志》对于太平革命军的制度和活动之所以能写得既真实又生动，都是这个缘故。

当然这里提供关于各种方志可靠程度的比例，不一定完全正确，具体情况还应作具体分析。

补充说明：地方档案原存各个行政单位，由于历年干戈扰攘，旱涝频仍，散失的百无一存，但还有不少因被地方志引用而得以保存流传至今，硕果仅存，倍感珍贵。

三、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在旧社会，地方志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编修的，起着维护和巩固反动统治的作用。它对反动统治集团歌功颂德，对农民起义歪曲污蔑；就是在记录自然现象如彗星的出现，陨石的降落时，也牵强附会地说成是“上帝”的意志，影响社会的安全和政局的变动，进行“天人感应”的说教。但尽管如此，地方志仍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

历代封建王朝利用地方志编写“正史”、地理书、一统志、会典、会要、辞书和类书等等。西晋以来的地理书、一统志，唐宋以来的类书、辞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大量的地方志资料。明代的《永乐大典》和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引用的较多，其中许多地方志原刻本已失传，但由于有一部分在这二部分著述中引用，得以保存至今。上海图书馆陈光贻同志编有《古今图书集成引用地方志辑目》可供参考。

清代顾炎武是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利用地方志资料的著名史学家。他引用大量方志中有关地形、水利、赋役、自然资源、自然灾害……资料编写了《天下郡国利病书》，目的是唤醒当局注意加强国防，搞好农田水利建设，减轻人民负担。他的志愿虽然没有实现——在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编著这一部书的动机是正确的，方法是对头的，直

到现在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还用方志资料编著《肇域志》现在已经整理，不久可望出版。

地方志中既有可以信赖的资料，也有颠倒是非的糟粕，我们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这部分文化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利用它为阶级斗争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利用地方志哪些资料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呢？个人设想以下四点供参考：

（一）整理研究地方志中有关自然地理、自然资源、自然灾害的资料，是进行基本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在进行水利工程、建筑工程、铁路工程……之前，必须了解所在地区的气候、地形、土壤、雨量、水文、资源及其发生的自然灾害情况，特别是地震灾害的情况，找出它的规律性，制订与规律性相适应的方案，增强各种建筑物的防震抗震能力。

湖北、湖南、江西及长江以南其他各省地方志，反映了地下宝藏包括稀有金属的名称、性能、用途及其分布的情况，如果对它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把研究成果作为勘探矿藏的线索，书本材料和实地调查相结合，就有希望找出更多更好的石油、天然气、煤矿、铁矿、铜矿、锡矿和稀有金属，也能为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创造条件，支援工业建设（或者先找《山西通志》和太原、泽州、阳城、高平、广灵……方志中有关矿藏资料，进行整理，吸取经验，逐步推广。仅雍正《山西通志》物产门就记录矿产十五页之多，艺

文门也有记载)。

(二)整理研究地方志中有关农业的资料,总结我国劳动人民的宝贵经验,为培养优良品种,提高操作技术,促进农业机械化,增加农作物产量,为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全面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江苏省《吴县志》、《吴江县志》和《震泽县志》、浙江省《湖州府志》和《乌青镇志》描绘水田耕作的工具和技术,纤细入微;浙江民国《新昌县志》附农事调查,分蚕、桑、烟、茶、术、矿六篇;光绪《于潜县志》载有耕织图四十六幅,这些资料都很珍贵,如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创造发明的能力。东北的《盛京通志》,山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县志记叙农具,有图有说,为研究我国农业技术发展史,提供了可靠依据。湖北盛产棉花,又以淡水鱼著称,《武昌县志》、《江陵县志》以及其他湖北方志反映了湖北鱼类的名称、品种、繁殖、生长和活动地点、情况等等,也提到渔民们因地制宜地制造了大小不同的工具,披星戴月进行捕捞,费力小而收获大。我们应当继承这些宝贵的经验,为大幅度发展社会主义渔业贡献力量。

早在四十年代,日本人就根据《八闽通志》、《霞浦县志》和福建其他方志编写论文,刊登日本鱼类杂志(现存湖北水生生物研究所图书馆)。日本渔业颇为发达,他们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是否与研究中国方志中鱼类资料,吸收我国劳动人民的经验有关,这是值得我们进行探讨的一个问题。

世界学者曾共推我国为温带植物最丰富之国,根据国内外学者考察采集所得,我国植物共有两三千种,与同温带的

北美洲植物比较，并无逊色。根据《庐山续志稿》记载：“我国园庭花卉植物种类之富，世界各国罕与伦比。据爱丁堡植物园园长史密司教授之调查，英国今日之园庭植物，百分之三十五以上产自中国。西谚谓：‘无中国花卉，不成庭园’一语，洵非偶然，而川滇高山之杜鹃花及樱草花，经西欧各国庭园栽培者，约七八百种之多，而国内罕有知之者。此类名花多数能于庐山生长，因土质与气候均甚相宜也。再则重要药用植物、人参、厚朴、杜仲、党参、贝母、石斛等等，在庐山均有栽培成功之可能，即将为栽培之试验。”

为使我国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需要很好地研究我国的地方志。

（三）整理研究地方志中科学技术资料，提供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工作者参考，有选择地继承这一部分遗产，激发我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贡献力量。

1、关于天文方面的资料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九七九年）四川巴郡人张因训创制浑天仪，有木人能撞钟击鼓，自动报时。他发展了唐代张遂（一行和尚）等创制的水运浑仪，是自动记时器的先驱，比欧洲自鸣钟的发明要早好几百年，在古代科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四川许多天文工作者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和排斥，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学术研究，如严君平以卖卜为生，袁天纲以挑柴叫卖为业，洛下閤是一个长期隐居于巴郡洛下（地名）的普通老百姓。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南溪人名叫陈溥的因家贫不能置仪器，便以笠写天，夜悬亭中，用证星象，辄验。同治光绪年间，在眉州受到爱戴的民间天文学

家郭宾俊是一个卖油的穷人。

明清反动王朝为了统治人民的思想，进行学术垄断，严禁私习天文历学，但是民间许多天文爱好者以大无畏的精神，冲破重重障碍，埋头钻研业务，取得显著成绩。例如关于极光的记载在湖北《竹溪县志》上有“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公元一八六二年）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人不能仰视。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堕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饼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十年以后，在一八七二年二月四日，太阳大爆发，在印度地理纬度二十七度到三十六度中的七个地方和更南的孟买，都观到极光。对这次的极光，我国的记载也很多，在陕西《大荔县志》、河北《东光县志》和湖北《光化县志》上都有。极光的研究涉及通讯、广播、空间探测、宇宙航行的空间科学，意义十分重要。

2、关于机械学方面的资料

四川方志反映了明万历年间合江人曹震在陕北创制“代遭陆舟”，“法极精巧”，行驶榆林沙漠地带，远远超过畜力。清朝中叶彭县唐希鼎、永川刘道煜等先后制造机器人，能运转数磨。唐氏所造，由五段组成，股臂咸备，负重则行，均不由师授。

3、关于方志的地理价值

方志的地理价值相当高，例如乾隆《黔滇志略》对于分布在贵州云南四十二个著名岩洞进行精辟的叙述，它从每个岩洞的所在位置，名称由来，到洞内顶部倒悬的石钟乳，到底部耸列的石笋、石柱都有生动的介绍，这就帮助我们了解

那些厚层石灰岩的分布，由于高温多雨，受到地表和地下水的不断侵蚀冲刷，逐渐溶解，形成了奇峰异洞、石笋、石柱、危岩、怪石等等的地貌特征。

广东、山西一部分地方志对于气候的变化与地形的关系，作了正确的阐述。广东《新安县志》（卷二）说：“粤为炎服，多燠而少寒，三冬无雪，四时似夏，一雨成秋……西南海滨，厥土涂泥，水气上蒸，春夏淫霖，庭户流泉，衣生白醭，既秋冬之间，时多南风，而础润地湿，人肤理疏而多汗。谚曰：急脱急着，强于服药，“此气候之大较也”。山西万历《潞安府志》说：“山川原隰异异，而气候早晚因之，是故物产异宜也，作息异齐也。上党山高，惟夏令不爽，冬令常侵入春秋之事，甚有入秋即霜，盛夏而雹者。试凭太行观之，中州之绿野铺茵，山中之黄芽始甲。迨夫千岩叶落，而山趾之树梢尚青。其气候之相悬盖如此，是以麦惟一熟，亦惟黍稷为宜”。（参考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著《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初稿》）

以上记载都是研究我国地理学的好材料。竺可桢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已在《何谓地理学》一文中指出：“自然地理中，地形、气候诸要素得以经纬仪寒暑表测定者无论矣；即人生地理亦何尝不可以科学方法治之。试以我国而论，各省居室建筑之形式、材料、广狭、高下各有不同，或用岩石、或用木材、或则穴土而居，或则依舟为业，此则与土壤之性质，森林之有无，雨量之多寡，气候之温寒均有关系，若实地详为研究，作有系统之叙述，其结果必为良善之地学。”（《史学与地学》第一期）

竺可桢同志提出这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直到现在好象